

影响

YINGXIANGXINZHONGGUO60NIAN
JINGJIJIANSHUDE
100WEIJINGJIXUEJIA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中的

100位 经济学家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4.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影响

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

100位 经济学家

4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4 / 吴太昌, 张卓元, 吴敬琏, 厉以宁, 刘伟主编.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54-0162-2

I. 影… II. ①吴…②张…③吴…④厉…⑤刘… III.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中国②经济—中国—文集 IV. K825.31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8590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本	73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5 2 插页
字数	553 000 字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数	1~3 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54-0162-2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200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国经济学家们在其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诸如人口经济理论、商品经济理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进外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经济体制转型等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创见和政策建议,为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宣传经济学家们的这种贡献,并激励后学,我们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丛书的成功出版,也是我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

该丛书的出版设想最初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提出。因为早在 1998 年,该社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教授等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 本经济学著作》,该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弹指一挥间,很快就十年过去,并迎来了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华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出版社领导萌生了再出版一套类似的

丛书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丛书的缘由。从这里也反映出了作为出版者的广东经济出版社领导的敏锐眼光。确实，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并越来越发觉到出版该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本丛书选编的百位经济学家，几乎全部囊括了影响新中国六十年来经济建设的我国重量级经济学家。他们的知名度之高，使他们的名字不要说在经济学界，就是在普通的民众中，只要是比较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也是多有所闻的。因此，在这套丛书里，可以说名副其实地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间经济学界群星形象的大聚汇，也是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这对经济学家们是一个很好的表彰，对广大读者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了解我国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机会。

其次，本丛书中的代表作和学术简历都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或者非常了解其情况的人士选择和撰写的。这就充分地保证了本丛书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和权威性。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应该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研究文献。从这些有时间顺序、时代特征和特定专题内容的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我国六十年经济建设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线索，而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思想脉络和不懈努力。

第三，本丛书中的不少论著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细心的读者当然会从文章的内容本身或者文章的题注和文后的一些说明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有的在当时我国的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引起过激烈争鸣并产生过很大反响，有的则是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有关决策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还有的则得过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经济学大奖，甚至有的文章是这三者兼而有之。可以说，其中的很多作品，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启迪。它们是我国经济学文献库中的宝贵财富，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献资料。

盛世出华章。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也为经济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要从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推选出大家比较公认的有影响力的百位经济学家，这是个相当不容易的工作；并且在推荐出来后，要及时全面地组织到相应的入编稿件，更是一件需要持续努力和工作量很大的事情。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经商量决定由《经济研究》编辑部来具体负责本丛书的组稿和编辑加工等工作，并付诸实施。我们在制定出初步的编辑出版方案的基础上，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小范围的专家论证会议，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由此确定了本丛书的编辑主旨、特色及经济学家的入编标准等，并初步遴选出了一批经济学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家入编候选人名单。

为了使全国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不被遗漏，使入编经济学家名单更具权威性，我们还以信函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京外共 50 余位经济学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来推荐认为可以入编的经济学家名单。这些积极帮助我们推荐候选人的经济学家包括（按音序排列）：陈继勇、费方域、谷书堂、何炼成、洪银兴、胡培兆、胡祖光、黄少安、黄祖辉、李炳炎、李江帆、李维安、李新春、刘少波、刘诗白、刘志彪、吕炜、毛蕴诗、逢锦聚、沈立人、史晋川、舒元、谭崇台、王珣、吴世农、夏振坤、徐传谡、姚先国、于金富、于良春、袁志刚、臧旭恒、张军、张馨、周振华、朱平芳等。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召开了本丛书的论证及编辑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按音序排列）：蔡昉、黄达、黄范章、贾康、李晓西、林兆木、刘伟、王诚、王一鸣、吴太昌、赵海宽、赵人伟、周叔莲、郑红亮、张问敏、张永山、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因故缺席。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百多位经济学家的专业特色各有不同，所属时代背景也有差异，因此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入编的主要标准。首先应明确，评选时要以改革开放以后为主，以改革开放以前为辅。其次，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学术贡献和政策影响力这两条。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委员们结合

已经遴选的经济学家入编名单和京外专家推荐的情况（如票数多少等）进行逐一论证，并以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补充增加了新的入编经济学家名单，由此最终确定了入编丛书的 106 位经济学家。当然，由于时间紧等各方面的原因，确定入编的 2 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最后没有能够编入本丛书，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确定入编名单以后，我们立即展开了组稿工作。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入编经济学家推荐自己的代表作 2～3 篇并撰写 1500 字左右的个人学术简历。被推荐入编的经济学家或其家属、秘书、好友等，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纷纷在百忙之中积极准备所需要的资料，认真精神令人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难以按时按质完成的。

在本丛书的编辑体例上，由于历史跨度大，所选文章的形式和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 年代以前的文章大多采用脚注的形式，而在之后则采取了参考文献加脚注的形式。这方面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尊重历史原貌，不强求统一。另外，经济学家们的学术简历的写作风格也比较不一样。由于丛书毕竟不是辞书，所以我们也尊重各人的写作风格，不强求一致，只是个别稿件应出版社的要求，请作者作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从出版社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但从风格多样化的角度看，也可能是个优点。当然，如果出版时间不是那么紧，或许这两个方面能够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经济学家的排序上，我们讨论过多种方案，如按出生年月排列，或先把经济学家按研究领域分类，然后再按某种程序排列；也曾经考虑过按照姓氏笔划排列；后经再三斟酌，同时也是根据张卓元老师的建议，我们采用了音序排列法，读者朋友们可以在时空的跳跃中，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进行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对话。

由于入编经济学家大多是名人、忙人，具体承担组稿工作的《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通过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不断地与有关经济学家或其家人、秘书等

进行沟通、催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最终完成了本丛书全部稿件的组稿工作。为了争取时间，编辑部还采取了组稿和编辑加工稿件齐头并进的办**法**，来了一批稿件，就马上安排编辑人员开始审读加工，并及时与出版社沟通，解决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参加组稿和编辑工作的人员有：郑红亮、王诚、张永山、金成武、王利娜、詹小洪、唐寿宁、俞亚丽、欧宏、王红梅。

广东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本丛书的出版过程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姚丹林社长等社领导曾几次来京与我们商量有关出版事宜。收到稿件以后，他们及时组织了社里的编辑人员集中审稿，并多次通过电话与我们讨论沟通，以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称道。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影响新中国 60 年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论证及编辑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目 录

林 岗	1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结合的内在依据及其他	5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	14
关于理顺国有制经济内部的产权关系	39
林 凌	51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几个问题	54
中心城市改革及其在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63
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87
林毅夫	95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	98
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	141
林兆木	175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言	178
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启示	192
论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	202
刘 鹤	213
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216
前十年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矛盾	233
为高速增长潜力转为现实创造条件	242
刘诗白	257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企业产权	259
论产权构建	269
论产权自主转让	279

刘世锦	295
结构转换缺口：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选择	297
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	314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普通性的重要经验	326
刘树成	33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	334
论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341
我国五次宏观调控比较分析	362
刘 伟	369
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理论	372
所有权的经济性质、形式及权能结构	389
刘遵义	403
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	408
吕 政	429
结构调整的任务	432
对中国与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差异的分析	438
国防工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	448
骆耕漠	463
论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重性	467
补论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重性	483
关于如何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	490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关系的论述	497
马 洪	509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	512
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	532
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大变革	545

林 岗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结合的内在依据及其他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
关于理顺国有制经济内部的产权关系

林岗，祖籍浙江桐乡，1952 年 4 月生于四川泸州。1968 ~ 1970 年在农村插队，开始自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71 年入伍，1977 ~ 1990 年在《解放军报》理论部任编辑，其间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师从吴树青教授，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 年）和博士学位（1990 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得到原国家教委中外联合培训项目和福特基金资助，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师从尼科拉斯·斯特恩教授从事最优增长和项目评估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90 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评审组副组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所有制和产权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口理论、经济学教学研究等。出版专著和文集 7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因参与国家体改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获 1989 年孙冶方经济学奖；1997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林岗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一些理论见解。

(1)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这种概括使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阐述由抽象程度较高的哲学原理具体化为经济分析的可操作范式。

(2) 凭借逻辑和经验检验，对新制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行比较，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制度变迁，尤其

是长时段基本制度变革的科学理论。新制度主义的一系列关键假设和推论即便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也是不成立的。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经济关系形式或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在直接生产中作为过程展开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内在结构是由与普遍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性质相适应的劳动的技术组织(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看法既不同于将所有制理解为物权的归属问题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将其等同于全部生产关系体系的说法。

(4) 现代社会的两种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都是建立在发达的现代分工这种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关系对于这两种所有制都是内生的结构要素。经典著作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关系将消亡,根本原因在于认为机器人大工业已经提供了消灭分工的技术条件,这是由历史局限造成的失误。由此而来的一个结论是:“大工厂”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过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落后国家公有制发展的初级形式。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分工体系的发育成熟,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必然生成市场关系。由此可以对社会主义国有制条件下现代企业制度包含的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多层和多元的利益和权利体系作出合理的说明。作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法律表现的产权关系,从纵向上说包括国家、企业、劳动者三个层次;从横向上说包括不同企业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约束下,其他方面的关系都可以而且应当纳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商法的调整范围。

(5) 提出一种关于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经营机制和行为方式的一般理论。认为由全民所有制包含的基本利益关系决定的、支配企业劳动者集体经济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是不会随国有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变化的,但在不同企业制度下,这一标准表现为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约束条件,效率后果相应地有很大差异。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在固有的基本利益关系约束下,改造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和权利关系,形成一种使劳动者的经济理性能够在企业行为中合理表达,从而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营机制。

(6)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建立并证明了一个区别于新古典最优增长理论的最优积累模型。

(7) 不同意用马尔萨斯理论来解释我国的人口过程,认为社会的人口行

为和增长模式取决于生产方式，解放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人口高速增长是由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

(8) 提出将创新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内容和形式，在经济学教学中发扬中国特色、树立民族风骨。与上述见解有关的文章，均已收入个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年）。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制结合的 内在依据及其他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现在，党的十四大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提法来概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必将极大地促进改革的深化。

—

过去很长时期内，在我国理论界占统治地位，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公有制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1978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认为，应当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必然性，在经济工作中应当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可以说是突破传统观念束缚的第一步。但是，直到十二大，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还是相当粗浅的，并未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所谓“板块论”，即认为国民经济是由互不相属的计划调节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拼合而成的。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计划与市场内在结合，在以市场为作用机制的价值规律基础上实行计划调节的含义。与“板块论”相比，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此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成为全党不可逆转的共识。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沿用“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

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并提出了建立不仅有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资金、技术、劳务等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体系的任务。事实上，十三大报告所描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大体上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不过，由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紧箍咒还未解除，十三大文件仍然回避了“市场经济”这个范畴，未能直接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十三大报告相比较，十四大报告有两个明显的进展：第一，断然否定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沿用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第二，突出强调了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毫不隐讳地揭示出实践中的而不是某些教条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性质，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归结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进展，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为改革的深化提供了基础依据。

二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是人们相互间发生经济联系的基本形式，因而要借助市场来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进行生产的问题，亦即将市场当作资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就是说，商品经济必然是市场经济。当然，从概念上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商品经济定义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即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且交换要以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尺度的经济关系。而市场经济定义的则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即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资源在不同部门和生产单位之间分配的机制。尽管有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是无从设想的。既然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并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

功能。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是一种市场经济。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回顾计划和市场问题认识历程时看到的，达到这一结论并不是径情直遂的。障碍主要来自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经济学传统观念。

这里所说的经济学传统观念，既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也存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不必多说。这里要引证一下敌视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那个挑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论战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米塞斯的言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因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资源配置注定是无效率的。他说，“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1988年访问我国时，正是根据米塞斯的这种逻辑，认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自由、私营的市场”，而且特别强调私营。前不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科思，在谈到东欧国家经济的“市场化”问题时也说，市场经济要有三个条件，即私有产业、契约制度和自由市场。总之，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这就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

受这种敌对思想营垒的看法的影响，有些人担心搞市场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忧心忡忡；有些人则认为不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就无法完成“市场取向的改革”。例如，较早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前几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只有私有制才能满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经济改革不应寻求使公有经济进入市场轨道，而应扩大私人经济的比重，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能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并存。东欧剧变发生之后，以分析“短缺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其新著《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中，也强调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竞争，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大力发展私有制。他还嘲笑在公有制经济中搞市场化改革是“模拟华尔街”，注定要失败。作为这种国际思潮的回声，在最近我国开展的关于社会